

# 穆斯林征服初期 安德鲁斯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sup>\*</sup>

夏 继 果

**摘 要：**在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西哥特王国强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而就在这一政策推行过程中，711—713 年穆斯林控制了该地区并更名为安德鲁斯。那里的基督教徒面临穆斯林的统治。在穆斯林征服初期，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如何？通过爬梳相关文献，可发现在 711—756 年期间，穆斯林或通过军事征服或通过签订和约的方式，确立了对安德鲁斯的管控；西哥特王国遗留下来的统治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维持，双向的调适发生着；基督教徒被迫缴纳人头税，在此前提下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会仍然如征服以前那样正常运行，所关注的问题亦未发生改变。从《754 年编年史》等拉丁文资料来看，基督教徒并没有把穆斯林的征服和统治视为一种宗教威胁，安德鲁斯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形成了一种相对和平的共存关系。

**关键词：**西哥特王国 安德鲁斯 穆斯林 基督教徒

5 世纪初，西哥特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西哥特王国。589 年，西哥特王国正式皈依基督教，并开始强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711 年，穆斯林渡过直布罗陀海峡，灭亡西哥特王国。穆斯林将其所统治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区称为安德鲁斯（al-Andalus）。至 1031 年，穆斯林维持着对半岛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此后，安德鲁斯的穆斯林统一政权——后倭玛亚王朝不复存在，割据的穆斯林小国取而代之；北方基督教徒的再征服运动趁机向南推进，安德鲁斯随之缩小。但直至 1492 年，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王国才攻占了穆斯林在半岛的最后据点格拉纳达，从而结束了穆斯林近 8 个世纪的统治。

穆斯林统治期间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如何？传统观点认为，穆斯林政府的迫害政策对基督教徒构成一种宗教威胁。这种观点滥觞于 850—859 年的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时期。这一时期先后有 50 人因公开侮辱先知穆罕默德、亵渎圣教，或者因公开宣布放弃伊斯兰教信仰而被穆斯林政府处死，其中三分之二是基督教教士、修士和修女。关于这场殉教运动，其中一位殉教者、神父欧洛吉亚（Eulogius）撰写了两本拉丁文献：《殉教圣人行传》和《殉教护教论》；另外，欧洛吉亚的好友保罗·阿尔维律（Paulus Alvarus）写下《欧洛吉亚传》。欧洛吉亚和阿尔维律著书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历史进程中多元文明互动与共生研究”（项目编号 08JZDH037）的阶段性成果。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了中肯的修订意见，特致谢忱！

立说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殉教者辩护。关于殉教运动发生的原因，两人坚持认为，宗教迫害导致了殉教运动的发生。两人甚至把矛头指向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教的所有信仰都是虚假的，其存在本身就足以引发正直的基督教徒的抗议；伊斯兰教是一大威胁，它诱使基督教徒去过一种邪恶的生活，如果基督教徒宽容这样一种敌对宗教的存在，自然而然就会减弱基督教的力量。<sup>①</sup>

在殉教运动发生之后的7个世纪里，欧洛吉亚、阿尔维律的著作以及那些殉教者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太多关注。<sup>②</sup> 16世纪，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莱昂的佩德罗·庞塞重新发现了欧洛吉亚的著作，在此后西班牙民族天主教主义泛滥的时期，这些著作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571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宫廷编年史家安布罗休·德·莫拉莱斯得知这一发现，顿感其价值巨大。当时，莫拉莱斯正在编写一部西班牙通史。这项工作缘起于一些意大利外交家抨击西班牙知识界没有编写出符合时代需要的伊比利亚历史。莫拉莱斯决心改变这一状况：“从那时起，我真正全力以赴从事这一工作，以满足我们民族的需要，恢复我们西班牙的荣誉和尊严。”在这种心态下，欧洛吉亚的著作自然使莫拉莱斯如获至宝。他在撰成《大编年史》后坦率地承认，给他带来最多快乐的是殉教者那一章，“因为在这一章，我不得不书写众多神圣的殉教者，他们使西班牙的荣耀得以褒扬，无论是在天国还是在现世，在上帝那里还是在世人面前……”<sup>③</sup>

这种传统观点的集大成者是19世纪西班牙历史学家弗朗西斯科·哈维尔·西莫内特(1829—1897)。他于1867年撰成其代表作《穆札勒布人史：以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作家最为可靠的证据为基础》，主要讲述了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3个世纪生活在安德鲁斯的基督教徒，即“穆札勒布人”(Mozárabes)的生活状况。西莫内特的西班牙民族主义立场在该书的开篇即已显明：“本书旨在为那些西班牙人书写一部历史……他们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对众多劳役、迫害、灾难，始终保留了宗教、民族精神以及罗马—西哥特遗留下来的基督教西班牙文化，成为荣耀的英雄、圣徒与殉教者，他们的行为和学识为新西班牙的重建和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形成了哥特—西班牙—穆札勒布人(Gotico-Hispano-Mozárabes)的历史发展轨迹。”<sup>④</sup> 这样，西莫内特把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扩及整个穆斯林占领时期。他的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西班牙统治者所采纳，并日益上升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弗朗哥统治时期达至顶点。

在传统观点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反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以及犹太人）在安德鲁斯创造了一种“宽容文化”。该观点同样起源于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时期。温和派基督教徒与以欧洛吉亚和阿尔维律为代表的激进派基督教徒针锋相对，视伊斯兰统治为一种既已发生的现实，需要做出一些让步，但他们认为这对基督教徒的身份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威胁：穆斯林是一神教教徒，与基督教徒信奉同一个上

① Jessica A. Coope, *The Martyrs of Cordoba: Community and Family Conflict in an Age of Mass Convers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5, p. 44.

② 参见 Ann Christys,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711-1000*,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2, pp. 54-55;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6.

③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pp. 36-37.

④ Francisco Javier Simonet, *Historia de los Mozárabes de España deducida de los mejores y Más auténticos testimonios de los escritores Cristianos y Arabes*, Madrid: Estab. tip. de la viuda é hijos de M. Tello, 1903, p. VII.

帝,是“信奉上帝和律法的人”。<sup>①</sup>

这种观点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地区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与西莫内特同时代的著名荷兰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杜齐(1820—1883)于1861年撰成《穆斯林西班牙史》。他认为,“总体上看,科尔多瓦基督教徒在外族统治下生活得很好”。<sup>②</sup>为什么会有殉教运动这种“例外情况”发生呢?他给出了两个缘由。第一,反对者主要由神父和修士组成,他们对穆罕默德、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持有极端的偏见,只会把伊斯兰教看成一种新的异端,把阿拉伯风俗视为邪恶的、淫荡的。第二,基督教神职人员有时会成为穆斯林民众不宽容态度的牺牲品,从而引发灾难性的后果。<sup>③</sup>

从佛朗哥政府执政的中后期开始,以西班牙历史学家阿梅里克·卡斯特罗(1885—1972)为代表的一批西班牙学者也开始挑战传统观点。卡斯特罗先后出版了《一部西班牙史: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1948)、《西班牙历史的结构》(1954)、《西班牙人:历史导论》(1971),对伊斯兰教给予了很高评价:伊斯兰教把自己的宗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融合起来,本身就非常宽容,“除了少数例外,宽容政策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得以实施”;科尔多瓦殉教运动期间穆斯林政府的压制措施针对的只是“怀有政治图谋的宗教人士……”<sup>④</sup>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学者玛利亚·罗莎·梅诺克的《世界的闪光点: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如何在中世纪西班牙创造了一种宽容文化》一书于2002年问世。该书从相互宽容的角度解读中世纪西班牙历史,认为在将近750年的时间里,犹太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共栖伊比利亚半岛,“尽管相互间有棘手的分歧和持久的敌对,但却创造了一种复杂的宽容文化”。<sup>⑤</sup>

可以看出,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关于安德鲁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相互关系以及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西班牙史学界乃至西方史学界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是民族国家历史向全球史发展的体现。但也应当认识到,关于该课题还缺乏具体、深入的个案研究,特别是对安德鲁斯早期历史阶段的研究。近年来,一些现存的拉丁文、阿拉伯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出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便利。<sup>⑥</sup>本文主要依据这样一些资料,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穆斯林征服

①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Views of Isla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in John Victor Tolan, ed., *Medieval Christian Perceptions of Islam: A Book of Essays*,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1996, p. 96.

② Reinhardt Pieter Anne Dozy, *Spanish Islam: A History of the Moslems in Spain*, trans. Francis Griffin Stokes,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13, p. 269.

③ Reinhardt Pieter Anne Dozy, *Spanish Islam: A History of the Moslems in Spain*, pp. 269-288.

④ Américo Castro, *The Spaniards: An Introduction to Their History*,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498-499.

⑤ Maria Rosa Menocal, *The Ornament of the World: How Muslims, Jews, and Christians Created a Culture of Tolerance in Medieval Spai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2002, p. 11.

⑥ 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2<sup>nd</sup> ed., translated with notes and introduction by Kenneth Baxter Wolf,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9.《754年编年史》最初用拉丁文写成,作者是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后的第二代基督教徒,姓名不详。关于穆斯林征服西班牙,较为详尽的阿拉伯历史著作出现在一百多年后,因此,要了解穆斯林统治在西班牙确立(从711年征服到756年后倭玛亚王朝建立)的情况,此书是最为重要的历史资料。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2<sup>nd</sup> e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2.这是一部非常实用的史料集。诚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特色在于其政治、宗教、文化、语言和种族方面的多样性”,相应地,这里的中世纪文献是“用很多不同的文字写成的”,包括拉丁文、罗曼诸方言、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等。可以想象,一位历史学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太可能读懂所

初期,即711—756年<sup>①</sup>安德鲁斯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共存关系,以期揭示在西哥特王国强力推行基督教化政策后突然又遭遇穆斯林统治的基督教徒的生存状况是否发生重大改变,面临严重的文化与宗教冲突?

—

公元前3世纪末,罗马帝国征服并统治伊比利亚半岛,半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罗马化,其居民融合而成为西班牙—罗马人。391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法律,禁止异教活动,支持基督教的正统地位,基督教在半岛得到传播。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西哥特人于5世纪初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西哥特王国。6世纪中叶,西哥特王国迁都托莱多。西哥特人最初信奉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斯派,但是其影响和教徒人数都无法与罗马基督教相比。为了稳固在半岛的统治,国王里卡里德于587年秘密接受基督教的洗礼,皈依罗马基督教。589年,里卡里德组织召开第三次托莱多会议。<sup>②</sup>这次会议的主题非常明确:西哥特王国彻底放弃阿里乌斯派信仰,立基督教为国教。会议向公众宣布,国王里卡里德、绝大多数阿里乌斯派主教和教士、西哥特贵族皈依罗马基督教。会议议定国家和政府在教会中的职能,进一步明确教规和戒律。针对主教辖区的组织机构和纪律,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其中包括主教有压制异教徒、非罗马教派信徒的权力。会议还规定了阿里乌斯派教士改宗的步骤和办法,那些愿意改宗的主教继续保留其宗教职位,即使这意味着在一个主教教区可能会有两个主教。在会议上,巴塞罗那、瓦伦西亚、图伊、卢戈、波尔图、托尔托撒等地的阿里乌斯派主教都公开宣布放弃原先的信仰,与其他罗马基督教的主教一起签署了会议的法案。<sup>③</sup>

皈依基督教后,西哥特国王对境内的犹太人<sup>④</sup>实施了一系列迫害政策。国王西塞布于613年下令,王国内所有犹太人必须皈依基督教,拒绝洗礼者将被鞭打100下,如果仍然拒绝,将被驱逐出境,没收其全部财产。在西塞布的法律颁行后,约9万犹太人被迫皈依基督教,其中就

① 有这些文字书写的资料。鉴于这种情况,近年来,很多其他语种的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史料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部《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人文选》就是这些英文版史料的选编。该书内容按时间顺序编排,把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的历史分成若干时段,成为其“章”;从每个时段选取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专题,成为其“节”;每一节有简短的导言,给读者提供历史背景及相关史料的总体情况,而所选取的几则史料都能从不同角度反映当时人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

① 756年,科尔多瓦后倭玛亚王朝建立,在此之前,大马士革的倭玛亚哈里发派省督管理安德鲁斯,因此711—756年被称为安德鲁斯历史上的“省督时代”。该时代的“省督”更迭频繁,短短的45年里就有22位省督先后执政,具体情况参见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7册,史希同、张洪仪译,纳忠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95页。

② 托莱多会议包括大约400—702年间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会在托莱多举行的18次会议。这些会议虽然是教务会议,但往往对西班牙政局有重大影响。

③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2<sup>nd</sup>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 54.

④ 犹太商人和旅行家在罗马帝国初期来到伊比利亚半岛并在此定居。最初,半岛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关系密切,互相影响。305年,基督教会召开艾尔维拉教会会议,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如何处理与犹太人的关系。关于犹太人在穆斯林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在穆斯林征服后的生存状况,笔者将专文论述。

有托莱多拉比伊萨克、托莱多犹太会堂总管勒维·萨慕尔等重要人士。<sup>①</sup>从此强迫改宗和殉教的时期开始了。最后一位推行积极反犹政策的国王是埃尔维格,从680年10月21日即位到681年1月9日第十二次托莱多会议召开,他起草了28个反犹法律。<sup>②</sup>埃尔维格反犹法令的核心在于正式禁止以任何方式信仰犹太教,为此,他禁止犹太人阅读、收藏基督教不予承认的犹太教经典,“违者将被当众剪去头发,鞭笞100下,且发誓永不再持有这些书或接受其中的观点,亦不思考或研究它们。如宣誓之后再次被发现此类违反,除遭受上述刑罚外,还将被没收全部财产并处以永久流放。鉴于系再次违反,其财产将由国王赐予某人永久使用。上述规定也适用于向儿童传授违禁思想的人。”<sup>③</sup>

西哥特王国的宗教政策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为穆斯林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条件。早在四大哈里发时期(632—661),阿拉伯人就开始了对外扩张。在伊斯兰教兴起之时,阿拉伯半岛西北部的叙利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叙利亚、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处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之下。633年,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派四路大军进攻叙利亚。635年,阿拉伯将领哈立德和阿慕尔围攻并占领大马士革。636年,在雅尔穆克战役中,阿拉伯军队取得决定性胜利。638年,耶路撒冷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议和,并交由阿拉伯人管理。至此,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地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南下,向同样处于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埃及进军,于642年攻占亚历山大,继而占领埃及大片地区。倭玛亚王朝(661—750)继续开展在北非的征服活动,于698年占领拜占庭帝国在北非的总督府迦太基。705年,倭玛亚王朝哈里发韦立德一世任命穆萨·本·努塞尔为阿拉伯帝国北非地区总督。穆萨一方面稳定北非局势,另一方面继续向西征服,最终征服非洲大陆西北角的休达和丹吉尔。711年,穆萨派柏柏尔人塔立格·本·齐雅德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进程拉开了序幕。

在现存史料中,关于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有阿拉伯文和拉丁文两种记载。阿拉伯文史料通常是这样记载的。在阿拉伯人占领之前,休达属于西哥特王国。但是,在阿拉伯人征服之时,休达总督朱利安因政治冲突正在寻找机会报复西哥特国王,故而愿意与塔立格合作,把柏柏尔人的军队运过直布罗陀海峡。那时,即位不久的西哥特国王罗德里克(710—711)正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北方与巴斯克人战斗,得知南方的危险形势,率军仓促南下,在瓜达莱特河岸与塔立格遭遇。罗德里克的军队被打败,他本人也毙命于此。塔立格乘机占领托莱多,并派穆吉特·鲁密率领的分遣队攻占科尔多瓦。穆萨得知这样神速的胜利,深恐塔立格的声望超越自己,因此亲自从北非的凯鲁万出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他用了4个月(另一种说法13个月)攻占梅里亚。他还设法羞辱塔立格,以显示其权威。哈里发韦立德一世同样惧怕穆萨建立独立王国,因此把穆萨和塔立格一起召回叙利亚。他们到达叙利亚的时候,韦立德一世已处于弥留之际。新任哈里发苏莱曼痛恨穆萨居功自傲,于是没收其财产,剥夺其一切权力。穆萨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塔立格也从此杳无音讯。穆萨离开安德鲁斯后,其子阿卜杜·阿齐兹留下来

① Jane S. Gerber, *The Jews of Spain: A History of the Sephardic Exper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p. 12; Bernard S. Bachrach, "A Reassessment of Visigothic Jewish Policy, 589-71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8, no. 1 (Feb. 1973), p. 17.

② Bernard S. Bachrach, "A Reassessment of Visigothic Jewish Policy, 589-711," p. 27.

③ Amnon Linder, ed., *The Law of the Visigoths*. 12:3:11, *The Jews in the Legal Sources of the Early Middle Age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02.

治理安德鲁斯。阿齐兹继续在半岛的征服，并且有传言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密谋恢复西哥特王权，但还没等苏莱曼把他召回叙利亚就被部下所杀。<sup>①</sup>

《754年编年史》也记载了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大致经过。711年，一伙西哥特贵族把罗德里克推上王位，遭到其他人反对，内战爆发。同一年，由穆萨派遣，塔立格率领的一支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军队从非洲进入伊比利亚半岛。还是同一年，穆萨亲自率领的一支军队在加的斯登陆，攻占托莱多，一些贵族被处决。根据编年史，罗德里克到712年才在与塔立格的战斗中被打败，并且被杀，地点是一个叫“特兰斯达克廷”(Transductine)的地方，失败原因被归结为西哥特军队的逃离和贵族间的派系之争。与此同时，穆萨在半岛东北部地区进行大规模劫掠，直到萨拉戈萨。712年底，韦立德一世把穆萨召回叙利亚。穆萨向哈里发交付巨额罚金，共200万金币，不久死去。至于塔立格在打败罗德里克后的情况，编年史没有提及。穆萨的儿子阿齐兹继任为省督，三年后即715年，部下因疑虑他将在半岛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而将其杀害。<sup>②</sup>

比较这两种资料的记载，可以发现，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差异，但关于征服的基本情况大致是相同的：它们都强调决定性战役的作用、国王被杀及其随从作鸟兽散、首都被攻占这三个主要环节，反映了这两种史学传统的一致性。关于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我们可以据此形成以下两个基本认识。第一，穆斯林的征服充分利用了西哥特王国的内部矛盾和冲突。西哥特王国的内部纷争可以通过其他材料得到佐证。考古资料显示，在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地区，属于该时期的铸币并未铸有罗德里克的名字，相反所铸刻的是国王阿奇拉的名字。<sup>③</sup>另外，有一些国王列表，它们没有提及罗德里克的名字，但却提到了阿奇拉，并称其统治时间是710—713年。如前文所述，在西哥特王国的中后期，许多国王推行激进的反犹政策。这一方面激化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也严重危害了西哥特王国的经济发展。西哥特王国贸易大部分为犹太人所控制，反犹立法只能导致贸易进一步遭到破坏。考古发掘显示，当穆斯林于711年到来的时候，很多罗马时期的城市已掩埋于地下。<sup>④</sup>其实，阿拉伯人自征服以来，利用敌手的内讧而达到其目的的是一个屡试不爽的手段。第二，穆斯林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是非常迅速的。到713年，穆斯林已基本完成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征服，统治了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征服者的军队中包括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在阿拉伯人扩张的过程中，北非的柏柏尔人由于其部落社会形态与阿拉伯人接近，因而集体改奉伊斯兰教。在进军伊比利亚半岛之前，柏柏尔人的伊斯兰化已达半个世纪。<sup>⑤</sup>因此，我们可以总体上把征服者视为穆斯林。作为被征服者的

① Ahmad Ibn Muhammad Al-Maqqari, *The History of the Mohammedan Dynasties in Spain*, vol. I, trans. Pascual de Gayango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009, pp. 250-300;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pp. 155-156.

②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 131-136.

③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p. 157. 阿奇拉是先王威提萨的儿子。威提萨于710年去世后，一些贵族推举阿奇拉为国王，但贵族会议却正式推举罗德里克为王。阿奇拉只好越过贵族会议，在半岛东北部称王。

④ Thomas F. Glick, *Islamic and Christian Spain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 2<sup>nd</sup> ed., Leiden, Boston: Koninklijke Brill NV, 2005, p. 17.

⑤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p. 150.

伊比利亚半岛居民,其信仰状况如何呢?西班牙传统史学认为,在西哥特王国后期,除少数坚持犹太教信仰的犹太人之外,伊比利亚半岛已实现了基督教化;在此基础上,传统史学将711年之后在半岛上所发生的事件完全置于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对立的角度来解释,认为这种对立最终以基督教再征服运动的胜利而结束。近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711年之前基督教只局限于城市,农村地区对于宗教的中立态度一直持续到11世纪,但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还有待考古发现的重大突破。鉴于此,笔者在这里采纳传统观点,即穆斯林征服之时伊比利亚半岛的主要居民为基督教徒。

穆斯林在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过程中,对于所遇到的基督教徒采取了怎样的政策?不可否认,在征服的过程中存在军事冲突与杀戮。除了上文提到的瓜达莱特战役这样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之外,近年来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这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个考古遗址是名为博瓦拉(El Bovalar)的教堂和居民点,位于塞格雷河南岸,地处加泰罗尼亚的莱里达以西几英里。教堂南面的居民区反映了征服的情况。发掘者认为居民区是在仓促间被放弃的,各种日用品散落其间。根据其中散落的阿奇拉金币,考古学家推测,这一遗迹是714年阿拉伯军队第一次在埃布罗河下游征服时所留下的。<sup>①</sup>

但是,征服过程也伴随另外一种情况,即缔结和约。关于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除了《754年编年史》和9世纪之后的阿拉伯文史著之外,保存至今的还有一份和平条约的内容。该和约签订于713年,也就是第一批穆斯林军队抵达半岛两年之后,缔约双方是穆萨之子阿卜杜·阿齐兹和穆尔西亚地区的统治者西奥德米尔(Theodemir,即阿拉伯语中的塔德米尔)。和约用阿拉伯文写成,被称为713年《塔德米尔和约》(The Treaty of Tudmir)。其内容如下: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此文件系阿卜杜·阿齐兹·本·穆萨·本·努赛尔(‘Abd al-‘Aziz ibn Mūsā ibn Nuṣair)赐予加布杜什(Ghabdūsh)之子塔德米尔的和平协议,据此他将得到真主和穆圣(愿主福安之)的保护。我们(阿齐兹)不会为塔德米尔或他的族人设定特别条件,不会侵扰他,也不会废黜他;我们不会杀戮或奴役他的族人,不会强行将他们与妻儿分离;他们不会在信仰上受到胁迫,他们的教堂不会被烧毁,圣物也不会被取出,(只要)他(塔德米尔)对我们忠诚,并履行我们为他设定的义务。条约对下列7座城市有效:奥利维拉(Orihuela)、瓦伦西亚(Valentilla)、阿利坎特(Alicante)、穆拉(Mula)、比加斯特罗(Bigastro)、爱罗(Ello)、洛尔卡(Lorca)。塔德米尔不得包庇逃犯或我们的敌人,不得教唆“保护民”惧怕我们,不得隐瞒有关我们敌人的任何信息。塔德米尔与他的族人(每人)每年应缴付一个第纳尔,以及四批量小麦、大麦、果酒、醋、蜂蜜和橄榄油。奴隶的缴纳额度减半。<sup>②</sup>

该文件可以给我们提供如下基本信息。第一,从该和约的内容来推断,穆斯林军队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军事征服更像是协商式的、渐进式的,这与传统上所理解的那种血腥的、一蹴而就的军事胜利形成对比。事实上,将西哥特王国最终拖垮的,可能是两种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pp.160-161.

② 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p.45-46.

包括西哥特王国都城托莱多在内的部分城市可能在穆斯林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迅速臣服；而其他城市则可能是通过更加平和的方式被兼并的，穆斯林或许利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条约，实现了与地方统治者和居民的合作。比如，该和约就对七座城市有效，充分反映了这种征服进程。第二，和约对于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给予尊重。它规定，被征服者“不会在信仰上受到胁迫，他们的教堂不会被烧毁，圣物也不会被取出”，就是说，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应被强迫放弃，或者说，不能强迫他们改奉伊斯兰教，其宗教设施予以维持，宗教仪式照旧遵行。第三，西哥特显贵此前的特权得以维持，其统治得到认可，其家庭生活得以正常维持。和约的这些规定对阿拉伯人也起到约束作用。第四，获得以上权利和自由的条件是要效忠于伊斯兰政权，并缴纳一年一度的人头税。从这些分析可以明确地看出，在713年的伊比利亚半岛，在与塔德米尔交涉的过程中，穆斯林征服者所考虑的首先是政治、经济问题，而不是宗教。

其实，放眼整个阿拉伯帝国，这种征服方式和统治制度在各地比比皆是。例如，在征服叙利亚的过程中，635年，阿拉伯将领哈立德与大马士革守军和居民订立和约，内容如下：“奉大仁大慈的安拉之名，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答应大马士革居民：倘若他进了城，他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房屋里。我们给予他们真主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人头税的数量是每人每年一个第纳尔和一袋小麦。<sup>①</sup>这是阿拉伯最初向外扩张时签订的一个和约，人们普遍认为，该和约是穆斯林处理与被征服者关系的范例，为后来征服埃及和伊比利亚半岛提供了借鉴。

追根溯源，穆斯林征服者与被征服地人们签订的任何协定都依据《古兰经》中的两段话：“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62）“对于那些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戒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经的人，你们要与他们战斗，直到他们依照自己的能力，规规矩矩地缴纳丁税。（9：29）”<sup>②</sup>

伊斯兰教法在阿拉伯帝国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些生活在伊斯兰国家通过缴纳人头税以换取信仰自由和人身安全的基督教徒、犹太人，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吉米人”，意为“被保护的人”。后来，穆斯林扩展了宽大对待的范围，“波斯的祆教徒（拜火教徒）、哈兰的多神教徒和北非的异教徒（柏柏尔人）”，都包括在了吉米人的范围之内。<sup>③</sup>这些吉米人“在农村里和自己的家园里，坚持自己的古老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马语和叙利亚语，波斯的伊朗语，埃及的科普特语”。<sup>④</sup>

因此，关于安德鲁斯，尽管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一份像《塔德米尔和约》那样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签订的和平条约，但是，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和阿拉伯征服者的惯例，可以设想，在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过程中，曾经签订过其他类似和平条约。

## 二

这类和平条约在省督时代的执行情况如何？进一步而言，在穆斯林统治之下，基督教徒的

①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第135页。

② 《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139页。

③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14页。

④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319页。



生存状况如何?这里从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安德鲁斯穆斯林政府接受了西哥特王国原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原来的统治秩序在相当程度上得以维持。

以塔德米尔家族为例。塔德米尔去世的具体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754年编年史》可以了解到,在他死后,其子阿什那吉尔德继承地产。阿什那吉尔德像其父一样,同样是一位灵活的政治家,虽然安德鲁斯的省督不断变换,他总能获得新省督的喜欢,并维持既有的权势。<sup>①</sup>西哥特贵族中得到塔德米尔父子这种待遇的人还有很多。在与罗德里克争夺王位的斗争中失败的先王威提萨的三个儿子在穆斯林征服中与塔立格达成妥协,因此,在穆斯林占领期间,他们在西安德鲁斯、南安德鲁斯的中心地带,在托莱多附近拥有大片地产。<sup>②</sup>受到类似礼遇的还有卡西乌斯。在穆斯林入侵前,他是北方巴斯克地区的一位伯爵,在征服过程中投降于穆萨,并被授权防御比利牛斯边境。他追随穆萨到大马士革,被哈里发接见,其地产得到确认。甚至还有一种说法,他在东方当着哈里发韦立德的面接受了伊斯兰教。<sup>③</sup>该细节很重要,因为它明确显示,一个著名的地方将领被安德鲁斯新政权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同化了。当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即,卡西乌斯成为穆斯林是权宜之计,他和他所控制的地区将因此免除人头税,免除任何外来干涉,因而可以更好地维持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适应是双向的。从征服之初起,穆斯林就受到了当地文化和习俗影响。《754年编年史》和9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阿卜杜·哈克姆<sup>④</sup>都记载了前面提到的阿卜杜·阿齐兹的最终命运。《754年编年史》的记载比较简单。715年,阿齐兹娶罗德里克的遗孀艾吉罗娜为妻。据说,阿齐兹为娶她,允许她保留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婚后,在艾吉罗娜的建议下,阿齐兹“试图摆脱套在脖子上的阿拉伯枷锁,为自己保住被征服的伊比利亚王国”。<sup>⑤</sup>正是由于这一点,阿齐兹的手下发动兵变,阿齐兹被杀。与之相比较,伊本·阿卜杜·哈克姆的记载要详细得多。阿齐兹娶罗德里克的女儿为妻。在世俗生活方面,她对阿齐兹施加了较多的影响。她问他:“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臣民崇拜你?我父亲王国的臣民崇拜他,在他面前下跪,而你的臣民则不然。”阿齐兹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命人在宫殿侧面开通了一个低矮的小门,他在这个门内的小房间召见大臣。这样,当人们觐见他时,需低头弯腰才行。她在一个隐蔽的地方观看,看到这一幕后,对阿齐兹说:“这样你就是一位伟大的国王了。”臣民得知这一点,以为她已把阿齐兹变成了基督教徒,因此利用计谋把他杀掉。<sup>⑥</sup>无论是拉丁文的记载还是阿拉伯文的记载,都可以反映出西哥特妇女对阿拉伯高官所产生的影响。穆斯林高官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穆斯林所受到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阿拉伯军

①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151-152.

② Richard Hitchcock, *Mozarab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Identities and Influenc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8, p.17.

③ Richard Hitchcock, *Mozarab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Identities and Influences*, pp.17-18.

④ 伊本·阿卜杜·哈克姆 (Ibn Abd al-Hakam, 约803—871), 埃及的穆斯林历史学家,曾撰写《征服埃及、北非和西班牙》(*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Egypt and North Africa and Spain*),被认为是保存至今的最早的阿拉伯伊斯兰历史著作之一。

⑤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136.

⑥ 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p.39-40.

人千里迢迢远征而来，一般没有妻室相随，因此，他们与安德鲁斯当地人通婚的现象应较为普遍。

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后，征服者维持原有的行政管理机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互相适应的情况也曾发生过。据记载，倭玛亚王朝的第一任哈里发穆阿维叶的妻子是基督教徒，他的财政大臣、医生、诗人也都是基督教徒。<sup>①</sup> 对于叙利亚的这种情况，《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的作者艾哈迈德·爱敏如此描述：“由于被征服各民族的文化比阿拉伯人的高，社会组织较为严密，所以被征服国的文化与制度便自然地居于统治地位。又由于阿拉伯人为战胜者的有利一方，所以他们有权力改变各种制度以适应他们的情况。因此，伊斯兰统治以前各地的一切制度与系统，如行政机关的组织，依然跟过去一样，行使于被征服各国，甚至到哈里发阿卜杜勒·马立克时代（684—705），各机关的文件，还沿用各国原有的文字。”<sup>②</sup>

第二，安德鲁斯的基督教徒按照和约缴纳人头税，在阿拉伯人直接控制的地区，基督教徒还要缴纳土地税；穆斯林政府通过设置新的管理人员、进行土地普查等形式来维持这种统治局面。

就安德鲁斯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类地区。一类是那些签约城市和地区，它们实行自我管理，按照和约规定向阿拉伯统治者缴纳人头税。<sup>③</sup> 在这些地区生活的主要是西班牙—罗马人，阿拉伯人取代西哥特人对他们的影响较弱，换句话说，他们远离阿拉伯人，就像曾经远离西哥特人一样。那些以农牧业为生的人，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继续榨着橄榄油、饲养着马匹，等等；另外，依前文所述，他们所需要负担的人头税数额并不大。不仅如此，他们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了改善。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犹太人获得解放，西哥特王国时期对他们的种种限制得以去除。这样，善于经商的犹太人又恢复了在偏远地区间的穿针引线，使得各地区间互通有无，便利了这些地区人们的生活。<sup>④</sup>

另一类是阿拉伯人直接统治的地区。这类地区包括从前的西哥特王室领地，711年、712年征服战争中被杀死的大贵族以及被穆萨处决的大贵族的领地；科尔多瓦、托莱多这样一些军事要冲、政治中心所在地。处于阿拉伯人直接统治之下的基督教徒，由于信仰问题不能参加阿拉伯人的军队，因此其生活方式主要是耕种土地，除了缴纳人头税之外，还需要缴纳土地税。关于这部分基督教徒所交土地税的数额，目前还没有相关资料可以证实。但是，倭玛亚王朝时期阿拉伯帝国税收制度的总体情况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参照。大体说来，帝国的税收基本分为三类：高额土地税、低额什一税、人头税。阿拉伯穆斯林耕种公地者，缴纳低额什一税；异族穆斯林耕种公地者，缴纳高额土地税，免交人头税；非穆斯林若不耕种土地者，仅交人头税，若耕种土地，兼交高额土地税。高额土地税通常按面积征收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税额一般为收成的40%—50%。<sup>⑤</sup> 在安德鲁斯，为了方便征税，省督侯拉（716—718）在西哥特行政体系之外设立了“法官”，负责向埃布罗河以南、以西的半岛地区收税。<sup>⑥</sup>

①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214页。

②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1页。

③ Roger Collins, *Early Medieval Spain: Unity in Diversity, 400-1000*, p.162.

④ Richard Hitchcock, *Mozarab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Identities and Influences*, p.12.

⑤ 纳忠：《阿拉伯通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6—327页。

⑥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136.

在征服后的最初几年里,安德鲁斯行政管理混乱,一些征服者群体无视相关规定,强占被征服者的土地财产。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某种形式的清查成为必需,以便以此为依据进行一定程度的税额调整。省督赛姆赫(718—720)在翻越比利牛斯山远征之前,这种调查已经开始。编年史家记载,他对整个半岛进行了一次“官方普查”(census),以便战利品分配正式有序地进行。<sup>①</sup>按照罗马帝国后期的词义,“a census”一词与其说是为了精确计算人口,不如说是为了有效征税。这次普查登载了地产的数量,用来作为估算税额的依据,以期减少乱收税现象。据说在省督叶海亚时期(725—728),整治税收很有成效。此外,《754年编年史》还记载,叶海亚没收了一些穆斯林占领的土地,并还给基督教徒。<sup>②</sup>当然,对于如何看待这种做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正义、友善的角度来解释;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纯粹是为了给征服者增加税收,因为如上所述,基督教徒的土地要交高额土地税,而阿拉伯穆斯林的土地只交低额什一税。把安德鲁斯省督的做法与此时倭玛亚王朝的总体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似乎第二种观点更有道理。通常说来,哈里发希沙姆时期(724—743)的特点是想方设法增加倭玛亚国家的收入。安德鲁斯的治理政策和措施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征服带来的问题,它们也是整个阿拉伯帝国进程的一部分。

第三,除了税收上的区别对待之外,基督教徒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宗教信仰的自由。<sup>③</sup>

前文提到的《塔德米尔和约》以及哈立德与大马士革守军和居民订立和约都尊重并保护被征服地区的宗教信仰。但是,从倭玛亚王朝执政时期叙利亚地区的情况来看,征服者穆斯林对于被征服地区基督教徒的政策是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化的,最初简明的管理吉米人的协定为复杂而森严的“界限”所代替。其中最著名的是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颁布的所谓“欧麦尔契约”。契约以基督教徒的口吻,做出如下规定:“我们不得在城市及其附近新建任何修道院、教堂,以及修女或修士修习场所;这类已有旧建筑如已破旧,或是处于穆斯林居住区,也不得进行修葺,无论昼夜。……我们不得模仿穆斯林的衣着,不得穿戴加兰苏瓦帽(qalansuwa)、头巾、足饰,也不得将发束分开;我们不得模仿他们讲话,也不能有尊名(kunyas)……无论在任何地方,我们不得随意变更装束;祖奈尔(zunnār)必须系于腰间。我们不得在穆斯林地区的任何道路、市场上显露十字架和书籍;教堂钟声不得过大;在礼拜过程中,或在穆斯林面前,我们要轻声细语;送别死者也要保持安静;我们不能在穆斯林居住的街道或市场中随意照明;下葬死者,需要与穆斯林墓地保持距离。”<sup>④</sup>该法规常常被当作穆斯林与基督教徒关系恶化的重要依据。

安德鲁斯是否也曾经存在过类似“欧麦尔契约”这样的法规?鉴于阿拉伯帝国在政策上的一致性,有理由给出肯定的推测。即便如此,考虑到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常常存在较大的差异,可以相信,这种针对基督教徒的法律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的实际状况每况愈下。关于8世纪、9世纪初安德鲁斯基督教徒与穆斯林的互动情况,穆斯林编年史家有一些记载,拉丁

①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 138.

②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 141.

③ 有关这一论题,本人曾做过简要的探讨,参见夏继果:《711—1031年的科尔多瓦: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互动与共生》,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5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80—182页。

④ 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pp. 43-44.

文资料也提供了很多相关信息,<sup>①</sup> 我们可以据此分析基督教徒实际的信仰生活。

这里以首都科尔多瓦的情况来说明。711 年,穆斯林征服并占领科尔多瓦,该城的西哥特贵族大多选择逃走,但其他众多的基督教徒并未跟随。总的来看,对于城内基督教徒的宗教生活和日常世俗生活,穆斯林政府并没有进行严格而持久的限制。宗教建筑的设立与修建情况能够反映一些信息。著名的科尔多瓦清真寺是如何修建的?穆斯林编年史家拉齐记载了相关情况。他提到,征服者最初挪用圣文森特基督教教堂的一半为清真寺,供穆斯林士兵祈祷之用。但是在接下来几十年的时间里,清真寺越来越拥挤,埃米尔遂与基督教社团的领导人谈判,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埃米尔同意赔偿一些现金,并答应重建在征服中毁坏的一所郊外的教堂,基督教徒则答应把圣文森特教堂的另外一半让给穆斯林。埃米尔接下来命令拆毁教堂,修建新的清真寺。<sup>②</sup> 在欧洛吉亚的记载中,提到了至少 13 个不同的基督教宗教机构,它们都靠近科尔多瓦市区:4 个长方形会堂(basilicae),9 个修道院,其中至少有两处是他小时候能记事之后建造的。而阿拉伯史学家伊本·哈扬在特地考察了科尔多瓦城内城外的教堂后认为:如果说最初的征服者拆毁了除圣文森特之外的所有教堂,那么后来的统治者则允许重建它们。<sup>③</sup> 另外,为了满足基督教信仰者的需要,科尔多瓦各教堂的钟声照常响起,提醒着祈祷时间已到。基督教徒葬礼队列可以经过邻近的穆斯林居住区。从着装方面说,除教士外,科尔多瓦基督教徒的衣着打扮肯定非常像科尔多瓦穆斯林。<sup>④</sup> 由此可见,“欧麦尔契约”中的诸多规定并没有在科尔多瓦实施。

正是由于生活在这样的宗教信仰环境之中,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内,安德鲁斯基督教徒改宗伊斯兰教的比例是很低的。迄今为止,在安德鲁斯基督教徒改宗问题的研究中,最具权威性的成果是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W. 布利特于 1979 年出版的《中世纪时期的改宗伊斯兰教:一项计量史的研究》。他利用该时期的阿拉伯传记词典,来研究阿拉伯世界各地的家庭采纳穆斯林姓名的比率。他认为,某一家族中,姓名从非穆斯林转为穆斯林的那一代人即为改宗的一代人,并据此勾勒了叙利亚、埃及、北非和安德鲁斯改宗伊斯兰教的人口比率的曲线图。在布利特看来,与前面几个地区相比,安德鲁斯显示出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从政治上说,它既不属于拜占庭帝国也不属于萨珊帝国;从宗教上说,它属于基督教的拉丁分支,那些归附到伊斯兰教的其他地区几乎对该分支一无所知;从种族上说,其西班牙—罗马人和日耳曼人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的土著人没有重要的联系。总之,西班牙与其他地区的唯一相同之处在于,它被吸纳为穆斯林阿拉伯人统治的一个地区。”但是,这里人们“取名的模式与东部地区是具有相似性的”。<sup>⑤</sup> 从改宗曲线图来看,叙利亚和埃及的曲线达到峰值的时间比安德鲁斯早 70 年左右,这与征服时间的早晚大致相当。他的研究显示,到 767 年,安德鲁斯总人口中只有 10% 是穆斯林,

① 拉丁文资料主要见于欧洛吉亚和阿尔维律的记载。本文所引用的相关资料主要转引自美国史学家肯尼斯·巴克斯特·沃尔夫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基督殉教者》(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② 转引自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p. 6.

③ 转引自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p. 13.

④ 转引自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Martyrs in Muslim Spain*, pp. 12-13.

⑤ Richard Bulliet, *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 Essay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114-115.

到864年穆斯林才达到该地总人口的20%—30%。<sup>①</sup> 布利特进一步指出,改宗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完全是个人信仰问题;改宗者从一个社会群体转换到另一个社会群体,改变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和经济机会。<sup>②</sup> 换句话说,基督教徒之所以改宗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在政治上、经济上。

第四,安德鲁斯的基督教会仍然如征服以前那样正常运行,托莱多一如既往地国家的宗教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神职人员并没有把穆斯林的征服视为一种宗教威胁。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下文予以详细分析。

### 三

要理解基督教神职人员在穆斯林入侵和统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需要综合各种史料分析。穆斯林大军压境时,托莱多的都主教是辛德里德。但在穆斯林征服后不久,他于712年逃往罗马,“就像一个雇佣工而不是一位牧羊人……抛弃了基督的羊群”。<sup>③</sup> 这是因为宗教迫害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西班牙的穆札勒布人》一书认为,辛德里德的逃离主要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在威提萨派与罗德里克派的斗争中,辛德里德站在罗德里克一边,罗德里克就是由他加冕的。罗德里克倒台后,在穆斯林统治下,威提萨派得到慷慨的封赐,辛德里德在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会的首领地位明显打了折扣,只好一走了之。“像辛德里德那样一位在基督教会中处于显赫地位的人放弃在托莱多的宗座而定居罗马,并不一定证明宗教迫害的存在。没有证据说明穆斯林参与了导致他离开政治上的勾心斗角。”<sup>④</sup> 不仅如此,有资料证明辛德里德的逃离只是个偶然事件。保存于马德里的手抄本《埃米利安之书》(*Codex Emilianense*)中排列着前后相承的托莱多都主教的姓名,一直到926年。<sup>⑤</sup> 它说明,托莱多基督教会的秩序并没有因为穆斯林征服而被打乱。

史实也的确证明,托莱多教会在安德鲁斯的大小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断提升自己的地位。穆斯林征服后,科尔多瓦取代托莱多,成为安德鲁斯的政治中心。但是,托莱多神职人员仍然像在西哥特王国后期一样管理着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会的事务。在萨拉戈萨,基督教徒按照犹太教的惯例,拒绝吃动物的血和窒息而死的动物的肉,认为这不干净,托莱多助祭伊旺提乌斯(Evantius)写信予以警告。约750年,托莱多的另外一位助祭彼得把一长篇专论送往塞维利亚,内容是关于如何确定复活节的日期。而在764年,科尔多瓦人菲利克斯(Felix of Cordoba)写信给彼得,旨在搞清楚一个问题:科尔多瓦的基督教徒“与犹太人一起斋戒”,这种做法正当吗?<sup>⑥</sup>

以上事例至少可以说明:一方面,以托莱多为中心的基督教会还在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基督教会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犹太教教规对基督教习俗的影响,而这类问题是305年艾尔维拉

① Richard Bulliet, *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 Essay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p.124.

② Richard Bulliet, *Conversion to Islam in the Medieval Period: An Essay in Quantitative History*, pp. 33-42.

③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132.

④ Richard Hitchcock, *Mozarab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Spain: Identities and Influences*, pp.20-21.

⑤ Ann Christys,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711-1000*, pp.21,27.

⑥ Ann Christys,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711-1000*, pp.23-24.

会议以来半岛的基督教会所一直关注的。通过下面关于“嗣子说”的争论，我们还会进一步看到，该时期安德鲁斯基督教会所探讨的问题都是穆斯林征服之前基督教教会所面对的，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其实，8世纪的托莱多教会之所以名声显赫，更多地是因为它卷入了“嗣子说”这样一个传统问题的争论。“嗣子说”最早出现在3世纪，认为基督是普通的人，因尊奉上帝的意旨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替人类“赎罪”，于是上帝纳他为嗣子。“嗣子”一词在伊比利亚半岛也是人所熟知的，以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就参与过嗣子说的争论，并形成了西哥特神学的三位一体说。在675年的托莱多宗教会议上，嗣子说的讨论成为一个重要议题。<sup>①</sup>穆斯林征服以后，在艾里潘都斯任托莱多都主教时期（754—约800），这种争论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艾里潘都斯主张耶稣基督既然由玛利亚所生，就不能称作上帝的儿子，只能说是上帝的嗣子或义子。与此同时，乌戈尔主教菲列克斯（Felix of Urgel）在其宗座宣传艾里潘都斯的学说。789年之后，乌戈尔转属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域内，从此，加洛林教会积极干预嗣子说的争论。792年，菲列克斯被召往雷根斯堡，当着查理曼和著名学者阿尔克温的面捍卫自己的观点。据说，阿尔克温之所以在加洛林宫廷占有一席之地，部分原因在于他给艾里潘都斯及伊比利亚半岛的主教们写了若干信件，谴责嗣子说。也正因为这样，他保持了对嗣子说的狂热的反对态度。他把给艾里潘都斯的一封信扩充为一本书，以便更广泛的读者阅读。他还请求查理曼批驳菲列克斯。从此开始了菲列克斯与阿尔克温的长期辩论，阿尔克温在这一过程中写成了《斥乌戈尔主教菲列克斯七卷书》。在795年的法兰克福教会会议和799年的亚琛教会会议上，嗣子说进一步遭到驳斥。

面对来自法兰克人的批评，伊比利亚半岛的教士团结起来。在法兰克福教会会议之后，艾里潘都斯及其同事给查理曼写了一系列信件，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是，到此时，对伊比利亚半岛教会来说，嗣子说的争论已渐渐变得不重要了，它“最终陷入了一种防御状态，在查理曼因文化复兴……而享有文化霸权的形势下，保护着一种古老的传统”。这样，嗣子说的争论变成了基督教内一个传统与另一个传统的对垒，到8世纪末，比利牛斯山两侧已处于两个不同的“基督学”世界。<sup>②</sup>

有一种假说，即认为穆斯林征服引发了嗣子说的争论。但在现存有关嗣子说争论的文献中，没有支持上述观点的证据，参加争论的主要人物中没有人认为争论是711年的穆斯林入侵所导致的。<sup>③</sup>嗣子说的争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通过它可以看到，在穆斯林征服后，伊比利亚半岛的基督教会仍然继续着古老的宗教论争，教会的正常运转并没有遭到破坏。不仅如此，安德鲁斯的基督教会仍然与比利牛斯山以北的教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联系并没有因穆斯林的征服而中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安德鲁斯的基督教神职人员

① 伯克富：《基督教教义史》，赵中辉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② Ann Christys,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711-1000*, pp. 24-26.

③ Ann Christys,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711-1000*, p. 26. 参见 Dominique Urvoey, “The Christ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uslim-Christian Confrontation in Eighth-Century Spain,” in Maribel Fierro and Julio Samso, eds., *The Formation of al-Andalus, Part 2: Language, Religion, Culture and the Sciences*,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1998, p. 37.

在古老的宗教问题上投入了很高的热情, 争吵不断; 另一方面, 他们对于作为一种新宗教的伊斯兰教却鲜有提及, 也没有把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出现看成是一种宗教威胁。以下将通过两部拉丁编年史的记载来进一步说明。

《741年编年史》<sup>①</sup>和《754年编年史》试图秉承始于攸西比乌斯的流行的编年史传统, 关注地中海政治史以及维持帝国霸权所面临的各种挑战。《741年编年史》的内容在西方始自西哥特国王里卡里德在位, 在东方则始自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登基。它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希拉克略打败波斯人以及穆斯林军队在叙利亚和北非的扩张。萨拉森人<sup>②</sup>“牢固地控制了入侵的地区, 在宏伟的叙利亚城市大马士革建立了王国”。作者叙述这件事时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似乎萨拉森人统治叙利亚与希拉克略此前统治该地区一样具有合法性。关于征服伊比利亚半岛, 作者只用一句话概括: “哥特王国在西部地区, 即西班牙建立起了长期而稳固的统治, 但遭到一位名叫穆萨的将领所率军队的入侵, 并且被征服, 缴纳贡赋。”<sup>③</sup>关于伊斯兰教, 该编年史只有寥寥数语: “今天, 萨拉森人膜拜穆罕默德, 在他们的所有圣礼和经典中, 都认定他是上帝的使者和先知。”<sup>④</sup>

《754年编年史》的内容开始于610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登基, 全书通篇以拜占庭皇帝登基为框架。在编年史的大部分内容中, 拜占庭、西班牙和伊斯兰帝国的历史是平行发展的, 在每一章中依次讲述。该书涉及了拜占庭人、穆斯林征服叙利亚和哈里发的更替, 但所关注的重点并不是这些事件本身, 只是利用它们建立一个世俗的年代参照系统, 把西哥特国王放到这样一个框架中, 以东方的资料将西班牙史变成一部普世编年史。在穆斯林征服后的时期, 编年史家主要关注的是安德鲁斯, 因此该书是了解这一时期的安德鲁斯, 特别是当地基督教徒的最好资料。关于征服者的宗教身份, 《754年编年史》的着墨甚至更少: 七次提到穆罕默德, 其中只有一次把他说成是先知。<sup>⑤</sup>当谈及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军事相遇时, 也没有划分宗教界限。它提到的各个群体都是按种族来划分的, 例如提到穆斯林时, 所用的词是阿拉伯人 (Arabes)、萨拉森人 (Sarraceni)、伊斯玛仪人 (Ishmahelitarum), 这些词交替使用。<sup>⑥</sup>它用摩尔人 (Mauri) 一词来称呼作为征服者军队中占主体的柏柏尔人。同样地, 对于穆斯林在欧洲遇到的人们, 它更多地用哥特人 (gothi)、法兰克人 (franci), 而不是基督教徒 (christiani)。编年史中并没有使用“异教徒” (pagani、ethnici、gentiles)、“无信之人” (infideles) 这样一些词。<sup>⑦</sup>

① 与《754年编年史》一样, 该书也是研究8世纪安德鲁斯的重要资料。但因过于简短, 其价值逊色于《754年编年史》。此书目前还没有英文译本。

② “萨拉森人”原指从今天的叙利亚到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沙漠游牧民族, 伊斯兰教兴起后, 特别是11世纪末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之后, 以基督教信仰为主的欧洲人普遍用“萨拉森人”指代西亚和北非的穆斯林。

③ John V. Tolan, *Saracens: Islam in the Medieval European Imagi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80.

④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Views of Isla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p. 87.

⑤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Views of Isla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p. 87;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 115.

⑥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很久, 这几个词已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常用词。在罗马人看来, “萨拉森人”一词所含有的“游牧民族”的意味是“阿拉伯人”一词所不具备的。在罗马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影响下, “伊斯玛仪人”一词被吸纳进拉丁语。

⑦ 参见“An Andalusian Chronicler and the Muslims,”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 36-37; Kenneth Baxter Wolf, “Christian Views of Islam in Early Medieval Spain,” p. 88.

编年史家没有刻意界定入侵者的宗教身份，因此，在叙述基督教徒—穆斯林的军事冲突时，并没有从宗教的角度来进行分析。作者提到了一个叫乌尔班（Urban）的人，此人“是非洲地区最高贵的人，从小笃信基督教，但在穆萨征服西班牙期间，他一直伴随左右”，在这种叙述中让人感觉不到谴责的意味。<sup>①</sup>关于人们所熟知的普瓦提埃战役（也称“图尔战役”），编年史的全部记载如下：

阿卜杜·拉赫曼<sup>②</sup>……长驱直入法兰克土地，与厄德在加伦河、多尔多涅河北岸遭遇了。有多少人死亡或者逃离，只有上帝才知道，厄德本人也迅速溜掉了。在追击厄德的过程中，阿卜杜·拉赫曼决定毁掉图尔——拆毁其宫殿、焚烧其教堂。在这里，他遭遇一位名叫查理的奥斯特拉西亚宫相。<sup>③</sup>查理年轻时就是一位杰出的军人，谙熟军务，被厄德招募到这里。在近七天的时间里，双方不断通过袭击来消耗对方。最终，双方摆开阵势，战斗惨烈。北方人坚不可摧，就像寒冷地带的冰川。眨眼之间，他们就用刀剑击败了阿拉伯人。奥斯特拉西亚人人数更多，武装精良，他们找到国王阿卜杜·拉赫曼，击中其胸部，了结其性命。无数阿拉伯人的帐篷就在眼前，突然之间，法兰克人收起了剑，因为在战斗的过程中天色已晚，他们要把战斗推迟到翌日进行。这一举动的确可恶之极。翌日黎明，睡醒的欧洲人发现阿拉伯人的帐篷和天蓬完全是昨日的模样。他们不知道里面其实已空无一人，还在设想里面的萨拉森人正严阵以待。他们派人前去侦察，发现伊斯玛仪人的军队已全部撤离。的确，敌人利用夜色掩护密集地撤离了，回到了自己的国家。由于担心遭到萨拉森人的伏击，欧洲人小心谨慎地四处搜寻，但一无所获。他们决定不再追击萨拉森人，带上掳获物——他们之间分配公平——回归自己的国度，一路狂欢。<sup>④</sup>

可以看出，作者尽管责怪查理·马特没有乘胜追击，但并没有把法兰克人描绘成专门为解救伊比利亚半岛基督教徒而来的虔诚信仰基督的人。但是，从爱德华·吉本开始，西方学者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立的角度解读此次战役的风气渐次成型。“吉本和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说，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sup>⑤</sup>

《754年编年史》描述穆斯林哈里发政权及统辖地区时所使用的政治术语也没有任何暗示其宗教色彩的意味。例如，关于大马士革哈里发帝国及其安德鲁斯省的“统治”，它使用的是 *regnum* 一词，与刚刚被推翻的西哥特政权和阻止了阿拉伯人北上的法兰克政权的“统治”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它用 *imperium* 来指代穆斯林“帝国”，与指代拜占庭帝国的用词没有什么区别，尽管穆斯林帝国规模很大，帝国内的民族差异性很大；它指代大马士革哈里发和马格里布总督时的用词有时是“元首”（*princeps*），提到穆斯林省督、军事将领时，用词通常是“首领”（*duce*）。<sup>⑥</sup>在评价大马士革哈里发或科尔多瓦省督的作为时，它从维持秩序和镇压叛乱的角度来评价其成效，全然不提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对基督教徒臣民的态度。<sup>⑦</sup>

①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134.

② 安德鲁斯省督（730—732），即通常所说的加菲吉。

③ 即法兰克宫相查理·马特。

④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145-146.

⑤ 菲利浦·希提：《阿拉伯通史》下册，第456页。

⑥ “An Andalusian Chronicler and the Muslims,”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38-39.

⑦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p.146-147, 156.



但是,《754年编年史》并非不关心宗教问题。关注宗教问题是拉丁编年史的重要传统之一,在攸西比乌斯那样的早期编年史家的著作中,不乏提到早期基督教世界所遭到的宗教威胁。《754年编年史》也多次提到穆斯林入侵之后安德鲁斯所出现的种种新的宗教现象。例如,721年,一个名叫塞里努斯的人宣传自己是“弥赛亚”,号召犹太同胞卖掉财产,跟他一起前往“应许之地”。<sup>①</sup>前文曾提到,750年助祭彼得教导塞维利亚基督教徒如何确定复活节日期,这也记载于该编年史。在安德鲁斯,为宗教异说而烦扰,但对于伊斯兰教却不予提及,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出现在《754年编年史》中,前面提到的关于“嗣子说”争论中的各种文件都反映出这种现象。

为什么安德鲁斯的基督教徒,特别是神职人员,只关注基督教业已存在的一些问题、基督教新出现的异端,而不关注征服者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呢?其实,这是本文前述历史进程的自然结果,或者说,本文前面的论述已充分回答了这一问题。所谓的穆斯林征服并不完全凭借其军事力量,在许多地方,征服是通过签订和约的手段完成的。像在阿拉伯帝国东部地区一样,安德鲁斯的统治者同样奉行“吉米制”,基督教徒除了缴纳人头税之外,不仅保留了其土地和财产,而且还保留了相当的宗教自由;基督教会也正常开展宗教活动和行使自己的权力。或者可以说,基督教徒的信仰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并没有受到711年权力更替的影响。

总结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穆斯林统治安德鲁斯的初期,征服者穆斯林与被征服的基督教徒基本保持着一种和平相处的关系。或者说,当时不存在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冲突,基督教徒并没有把征服者看成是一种宗教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穆斯林征服伊比利亚半岛只是一次普通的军事征服,并不存在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作者夏继果,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文明区划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089〕

(责任编辑:舒建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sup>①</sup> “The Chronicle of 754,” in *Conquerors and Chroniclers of Early Medieval Spain*, p.140.

commerce in August 1929, ensuring them a safe passage through the political crisis and continued legal existence. Not only did this amendment have unique causes, it also involved a complex process with which the chambers of commerce were intimately and proactively associated. In general, the reorganized chambers of commerce under the new law on chambers of commerce retained their identity as independent non-government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groupings.

### **Anti-Germanic Feeling and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Early Byzantine Empire**

Dong Xiaojia and Liu Rongrong(108)

The early Byzantine emperors inherited and further developed the Roman republican and imperial policy of recruiting barbarians into their armies. This measure was aimed at securing the borders of the empire. On the one hand, the policy helped reduce the growing pressure on the borders and increased the pool of military recruits; but on the other, it meant that barbarian soldiers, represented by Germanic tribes, held important positions in the army, leading to the barbarization of the empire's military forces. Barbarian forays from outside the empire's borders and the growing numbers of barbarian soldiers and commanders within them aroused anti-Germanic feeling. These subjective sentiments combined with the objective contradiction between military and imperial power in the Byzantine political system was to bring about a political crisis in the late 4th and early 5th century. This was the most serious crisi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antinople.

### **The Circumstances of Christian Survival in Al-Andalus at the Beginning of Muslim Conquest**

Xia Jiguo(126)

Before the Moslem conquest of the Iberian Peninsula, the Visigoth Kingdom had forcibly converted the inhabitants to Christianity. While this policy was being implemented, from 711 to 713 the Moslems were completing their conquest of the area, which they renamed Al-Andalus. Christian converts now faced Moslem rule. At this early stage of the Moslem conquest, how did the Christians survive? Early literature tells us that between 711 and 756, the Moslems established their control over Al-Andalus through military conquest or peaceful agreements; the governing order bequeathed by the Visigoth Kingdom was maintain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and a two-way process of acclimatization was under way. The Christians enjoyed freedom of

religion provided they paid the capitation tax imposed on them, and Christian churches operated normally as they had before the conquest, with no change in the issues that concerned them. Some material in Latin, including the *Chronicle of 754*, indicates that the Christians did not view the Moslem conquest or Moslem rule as a religious threat. A relatively peaceful relationship of co-existence grew up between Moslems and Christians in Al-Andalus.

---

*Discussion and Remarks*

**On the Re-recogni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ate**

Yi Jianping(143)

The problems with the two indicators of Morgan-Engels' theory of statehood are that the "regional principle" cannot cope with the material on consanguinity in such disciplines as history and archeology, a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power" is a sweeping and ambiguous concept that needs to be further detailed and specified. Max Weber's definition of the state cannot be applied before "modern" times, and his exposition of the state contains logical contradictions and other mistakes.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state in academic circles reveals an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early state" and the "mature state", that is, in Weber's criteria for statehood. We should make distinctions only on the basis of the circumstances or degree of control of "monopoly of the legitimate use of physical force"; in this way, we can view the state as defined by Weber as the "complete state", and divide previous states into the two stages of "early states" and "mature states".

---

*Historical Notes*

***An Embassy to the Frontiers Is not Related to Cui Xiyi's Defeat of the Tubo***

Dai Weihua(162)

**The View of Civilizations Held by Followers of American Arbitrationism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Liu Yiyong(168)

---

**Abstracts of the Journal History and Theory**

Translated by Yang Guangshuo (181)

---